

1610



第四辑

政协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魏都文史资料

魏都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元月

《魏都文史资料》第四辑

顾 问：李茵（区政协副主席）

总编辑：菅金柱 仪永恩

目 录

纪登奎同志在营庄·····	李耕五 管金柱 (1)
“华子良”两次来许昌·····	李耕五 (8)
郝寿卿烈士事略·····	沈世昌 (19)
我的戏剧艺术生涯·····	李珍荣口述 王亚代笔 (24)
百岁种烟老人董松山·····	李耕五 (30)
中原大战中的樊钟秀·····	孔子静 (35)
武术名家寇运兴事略·····	孔子静 (41)
许昌市环卫事业发展的艰苦历程·····	中西亭 (48)
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节录)·····	<u>杨却俗</u> (53)
许昌抗日救亡运动见闻·····	李春如 (64)
许昌商民抗税斗争记·····	李 济 (68)
忆三十年代的许昌商业·····	郭荫青 谷凤英 (70)
私营兴亚烟厂始末·····	张鸣歧 (73)
老九霞鞋庄简介·····	张堂轮 陈昌泰 (76)
同德堂膏药店·····	李太和 (79)
县长据理斗洋人·····	张茂武 (81)
黄典当智服洋骗子·····	李太和 (83)
解放前许昌同业公会及职业工会简介·····	李季安 (85)

我所知道的培德中学·····	王庭槐 (87)
我的母校“许昌回小”·····	艾荣泉 (91)
教师生涯散忆·····	赵中兰 (100)
邱清泉之死纪实·····	远硕卿遗稿 谷凤英整理 (107)
烟老虎周锦棠丑闻·····	李季安 (109)
殂於柱伏法记·····	赵金鉴 (114)
民国年间许昌城厢大事记·····	许志 (117)
国民党许昌党部回忆录·····	赵金鉴整理 (127)
许昌参议会的成立·····	张栋甫 (143)
许昌古城街巷寺庙漫谈·····	李季安 (145)
齐礼街共齐礼·····	李太和 (151)
双惠胡同，王在其中·····	李太和 (153)

纪登奎同志在营庄

李耕五 管金柱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纪登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今年八月初，在他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俩满怀深情，专程到了曾被她称之为“我的第二故乡”的许昌营庄进行了走访。

在村委会，我们见到了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管全志。此人看上去有三十六、七岁，个子不高，既精明能干，又热情、好客、健谈，当我们说明来意，提起纪登奎时，他象打开的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俩介绍：我们营庄村位于许昌市北二、三里的城乡结合部，107国道贯穿南北，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全村共有642户，2624口人，土地1927亩，人均0.7亩。六十年代人多地少，社员吃都吃不饱，更没钱花。这些年人口增加，土地逐年减少，但是，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办实体，建新房，村里修了柏油路，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家家有存款，人民生活大变样。去年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元，今年预计将达到一千五百元，已基本达到了小康村水平。这些巨变，一是靠近年来党的富民政策；二是靠全村群众的拼搏，靠科学、靠管理、靠实干。然而，上些年岁的父老乡亲们也忘不了最初带领我们致富的“老纪”——纪登奎同志。

纪登奎他生于1923年，十五岁参加革命当“八路”，十六岁入党，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许昌地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国家副总理等职。早在五十年代就经常到营庄指导工作。1965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又带领省委工作队到营庄村搞“社教”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当成一名

普通社员，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全村的社员打成一片，人们尊称他为“老纪”。他和社员们称兄道弟，称营庄是他的“第二故乡。”日子长了，村民也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在百忙中，还多次回“故乡”视察指导工作。直到1988年逝世前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营庄村。

不叫书记叫老纪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当年纪登奎住队时的老房东李法林。谈到纪登奎，老李非常高兴，自豪地向我们叙说了一些往事：

纪大哥可是个大好人，和他相处那阵子，我和老少爷们都感到他身居高官，但从来不带一点官架子。记得初到我家住时，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省里下来的大干部，见别人都叫他老纪，他又比我稍大几岁，我也就叫他老纪哥。他非常高兴，每次进家，啥活都干，我家吃啥他吃啥。全家人对他无拘无束，说长道短，象自己家里人一样。后来，当得知他是省委副书记时，我就改口叫他纪书记，他听了很不高兴，严厉指责我：“你今天怎么这样叫我？我是咱家的一员，不应叫书记，要叫老纪，叫大哥，叫书记就外气了，莫非是不想让我在这几住了吧？”我忙解释说：“我家从来没有来过市里的干部，别说你是省里的大干部，以前都怪我不知道，向您称兄道弟不合适。”他看我有点为难，便哈哈一笑，接着说：“南京到北京，老哥是官称，你越叫纪大哥我越高兴，喊书记是外边的官话，到家，到自己村还是叫我老纪更亲切。”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到营庄从来都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所以，村里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老纪”。

老纪帮俺治穷致富

我们见到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根堂同志时，他说：纪登奎书记思想敏锐，办事果断，作风深入，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虚心好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带领省委工作队到俺村搞“社教”，虽然执行了一些错误路线，但是他没少为群众办好事，调中央后仍没忘帮俺村改造低产田。尤其是为帮我们“治穷”，他踏遍村里的每块土地，走访了许多社员。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制定出改变营庄面貌的一些具体措施。主要是抓好改土、打井、植树三件事。并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群众战天斗地，为村里脱贫致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而深受群众的爱戴。

第一件事是改土。农业要高产，首要的是以肥田沃土为基础。六十年代我村粮食产量上不去，始终徘徊在亩产七、八百斤上下。为此我们也很苦恼。老纪带我们视察了全村的每块土地，看到已改道的老“许开公路”两旁沟壑很深，接着就是许多一头高一头低的“搭拉头”地，每遇暴雨，水滚岗而下，肥土冲走，庄稼根裸露在外，呈现出大片的雨淋沟。逢于旱无雨季节，无法灌溉，粮食减产甚至绝收。老纪当即决定，发动群众，动员全村的所有劳动力，发扬愚公精神，削岗填沟铺路，平整土地。他亲自动员，亲自挥锹上阵。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改造“搭拉头”地千余亩，新造田百余亩。

第二件事是治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村属贫水区，三年两头旱。每逢干旱年，井干河枯土地裂缝，庄稼枯萎，就连社员吃水都十分困难，那还顾得上浇地。纪登奎调中央工作后，1970年7月到村视察，看到地里的庄稼旱得卷了叶，许多社员到村外很远的地方担水、拉水，他十分痛心，就立刻把地区水利局的技术

员请来“会诊”。经认真调查勘探，浅水层资源贫乏，深水层可以开发。老纪同我们一起制定了“合理布局，深浅结合，综合开发利用”的兴修水利方案。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打了几眼深水井，40眼浅水井，平均每50亩一口井，不但解决了社员吃水困难，还基本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使全村的粮田都变成了稳产高产田，粮食产量翻番，跃上了新台阶。直到那年冬天，王留东（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同志到北京开会，老纪还专门询问此事。当听到“深井打300来米，已全部出水，水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时，老纪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第三件事是植树。老纪那年在这里搞“社教”，刚到没几天，他就发现村南边清沂河岸宽阔平坦，长期荒闲，是植树的好地方。便对我说：“老陈呀！光搞粮不行，毛主席要我们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要有钱花。村里有位老人说的好，要想富，多植树，我看把南河堤上种上杨树，它高大挺拔、仿佛我们营庄人的性格。数年后成林成材，我们既可乘凉，又是一大笔收入，那该多好！”在他的倡导下，我们说干就干，共植树万余棵。十多年后，仅此一项就为我村创收几十万元，为营庄村的小康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陈根堂同志拉着我们的手说：“为官一任，造福于民。象这样的好干部，我们营庄村的老少爷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的。”

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

陈根堂还向我们介绍说：纪登奎同志不仅在工作 and 生活上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以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也是言传身教，要求很严格，丝毫不搞特殊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时，老纪在中共河南省委任副书记，他把两个女儿和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小虎，都一齐送到营庄插队劳动锻炼。刚开始，村里领导和社员们认为，城里来的学生，年幼且身单力薄，又是高干子女、不忍心让他们干重活，总是分配个较轻的活干。老纪得知后立即对我们说：“种地需要粪，对小虎他三个你们不要娇惯，应严格要求，脏活重活应让他们多干点儿，加强锻炼。从明天开始，让他们三个都进城拉粪拉尿去。”三个孩子都严遵父训，那段时间急队里所需，都到城里往家拉粪。他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专拣脏活重活干。社员们夸奖他们说：“这才象是农民的好儿女。”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原来不愿拉尿的小青年，也都拉起了尿车，从而解决了肥料不足的问题。

谈话中，一位倪大嫂插言：“那天小虎轮到我家吃饭，因为是青菜淡季，没有鲜菜，我给他熟了半碗咸酱豆，端上去当菜下饭。那知他竟不怕咸的蜇嘴，吃了个净光，当时我误以为他爱吃，就又端上了半碗。小虎竟说：‘大婶，我实在吃不下了，咸得我舌根直发麻。’我说：‘傻孩子，你怎么不早说话，吃不完放那儿就是了。’小虎说：‘那是我硬着头皮吃下去的，爸妈都交待我，‘你是我们的儿子，又是社员家的儿子，在社员家吃饭，群众吃啥咱吃啥，不要搞特殊化。粮食来之不易，更不准留剩饭！’可是，他小虎毕竟是孩子，我这个人也太傻了。”

倪大嫂讲得有声有色，把在场的人都说笑了。陈根堂又继续对我们说：老纪对子女严格要求方面真使我们佩服。记得那年，他的大儿子坡民大学毕业后，他把他送到了密县煤矿下井挖煤锻炼。干了一年多后，有一次不慎，矿灯将他的背部烧伤，住进了医院。当时许多一块儿去的学生调走，就是没走的也都调换了工作。坡民作为省委书记的儿子能说没有想法？矿领导也有心想给

他调换一下工作，便帮他出主意，让他待伤好后趁在许昌出院之际，找他爸说说。当时坡民见老纪时我在场。坡民说完后老纪当即就表态：“你不要和别人比这个。你要记住，你是省委书记的儿子，休想来我这儿开后门。要服从分配，听从矿领导的安排，要做出个好样子来。”坡民无耐，只好回到矿上，继续下井又当了一年之久的挖煤工。

身居中央不忘“故乡”

原任党支部书记王留东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纪登奎调中央工作后，无论工作多忙，他都时刻惦念着“故乡”的人民，抽时间或路过许昌，几乎每年都要回营庄看望。他每次来总是事先不打招呼，行至村边地头，下来步行到田间走一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和收成，和路遇的社员群众聊天攀谈，体察民情，问长问短。待了解情况后，方进村，同村干部一起运筹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大事。

记得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遭水灾，听说许昌也有大水，纪登奎视察归途中，又专程到营庄看望。小车一过小南海大桥头就停下了。老纪和秘书李天资、通讯员唐运江一行三人向村东头大田里走去。当他看到满地的秋庄稼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他便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进了村，听取村干部的汇报后说：“天助我们营庄人免受水灾，你们应多打粮食，多做贡献，支援灾区……。”当晚，许昌地委领导派专人三番五次到俺村来接他到招待所下榻，都被他一一谢绝。后来，地委书记王延太又亲自来接，他说：“营庄就是我的家，有家乡的人民保护我，比住什么地方都安全。”就这样，老纪又回到老房东李法林家住了四五天，并对农村各项工作进行了调查了解后才离去。

王留东同志接着又说：1986年老纪身体欠佳，我和金松振（当时村党支部书记）于7月份到北京前去探望时，他已经是疾病缠身了，但仍坚持多听一些营庄的情况。当我们讲到村里的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为满足国内造纸工业的急需，决定筹建一个工业用呢厂，生产为造纸机配套的毛布时，他忙问“经过考察论证了没有？”我们说：“已经考察论证过。地方政府很支持，但买机器设备很困难。”老纪二话没说，当即写了一封便信。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村很快买到了机器。到8月份我们再次看望他时，一见面，他第一句话就问：“机器买到没有，厂子筹建得怎么样了？”我们向他汇报：“机器已付款待运，工厂已动工兴建。”他又问：“现在社员收入如何？”我们说：“由于党的富民政策好，社员人均收入已由过去的不足200元增长到千余元。村里又搞了新规划，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他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並连声称赞：“好！好！好！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早日建成小康村。到那时，等我病好再回家看一看。”我也高兴地对他说：“营庄村的父老乡亲们也都很想念您，等病好后一定欢迎您回故乡视察。”可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他还没来得及再回营庄，无情的病魔竟夺去了他的生命。1988年7月13日，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纪登奎同志溘然与世长辞了，终年仅65岁。噩耗传来，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十分悲痛。我和金松振、段嘉岭一行三人满怀悲哀，代表营庄村2500名村民于7月16日专程赴北京吊唁，并向他敬献了花圈。

写于一九九三年九月

“华子良”两次来许昌

李耕五

华子良是60年代初在我国问世的文学名著《红岩》一书中的艺术典型。该书一经问世，其事迹就轰动全国，加之后来以该书的一些主要故事情节拍摄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放映，因之书中所写的华子良、江姐、小萝卜头等人物，成了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可歌可泣的英雄。

“华子良”的生活原型叫韩子栋，山东阳谷县人，和历史上的武松是同乡。他1929年开始在淄博煤矿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叛徒告密，在北平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等国民党秘密监狱，后又被解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并在狱中和郑发相识。1947年韩子栋越狱到许昌，在郑发的关照与掩护下，平安到达豫北解放区。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在60年代前，一直鲜为人知。

1962年的一天，河街村放映电影《烈火中永生》，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喜昌得知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介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狱中斗争的故事。由于郑发是郑喜昌的族叔，两家是近邻，二人平常关系又好，郑发又对喜昌谈过他在重庆“白公馆”住过的事，于是郑喜昌就专门邀请郑发一同去看电影。在看电影时，二人并肩而坐，当电影中出现江姐、小萝卜头的形象时，郑发兴奋地告诉郑喜昌说：“像江姐这样的女英雄，我在监狱曾见过。”又说：“小萝卜头是个既懂事又很聪明的好孩子，他

他们是宋先生和徐女士的儿子（即我党地下工作者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宋系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他自小就跟父母进监狱。宋先生夫妇俩常到我家去，小萝卜头也常到我家去玩，叫我郑爷爷。我很可怜他，每次他到我家时，我都要给他拿点好吃的，他总是自己舍不得吃，把它带进监狱里送给别人吃。”当银幕上出现华子良的形像时，他更高兴了，说：“这个‘疯子’我也认识，他的装疯我在狱中已经看出来。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就主动接触他，经过长时间交往，他也知道我是个好人，当时我曾悄悄把我家的住址告诉他，让他将来出狱到了河南，一定要到我家住些日子。后来，他果然到许昌来找我。”郑喜昌听了郑发所谈大为惊喜，当晚电影煞映，他没让郑发回家，就先邀他到自己屋中，让他把与华子良的相识并来许昌找他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第二天，他就把郑发所谈的情况又如实的告诉了公社领导。从此，郑发和华子良的事迹才被人知晓。1981年我访问郑喜昌时，他把郑发所谈，又详细地告诉了我。1987年韩子栋重访许昌，我向韩老面询过此事，韩老所谈也完全和郑发所谈相同。现对韩子栋两次来许昌的经过，整理记述如下，以飧读者。

韩子栋首次来许昌

1947年夏末，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计划集体越狱逃跑。由于敌人守卫森严，越狱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在能逃出一个是一个的紧急情况下，经狱中党组织决定，让韩子栋利用装疯已经麻痹敌人的有利条件，一个人越狱逃跑。韩接受党的指示后，利用上街买菜的机会，机智地甩开跟随他的特务，几经周折，终于逃出虎口。他巧妙地渡过嘉陵江后，为防军统局特务追捕，秘密地钻深山入老林，昼伏

夜奔，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一路途经四川、湖北，最后终于来到河南许昌。当时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都已解放，黄河以南的蒋管区为了防共，层层设卡，步步设防，身份证便成了人们行动的“护身符”。有了它，任行千里，没有它寸步难行。韩子栋来到许昌，本想继续北上，早日到达解放区找到党组织，可他从襄樊到许昌就被关卡盘问十多次。许昌距国民党设在黄河沿岸的封锁线更近，如果没有身份证，北上就更难了。在困难中，他想起了当年郑发临走时说给他的那些话。他想，郑发当年虽然自称是找蒋介石认弟的，但蒋并没认他，却又把他关进了集中营。郑发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为人耿直，又重义气，当年对他那些嘱咐是出于诚心，不会有虚假。想到这里，就决定先去找郑发。

当年郑发曾清楚地告诉韩子栋，他的家住在许昌城西北12里河街村，为了让他一旦来了更容易辨认他们住的村子，郑发夫妇还告诉他，在他们村东头有两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如果找到了双槐树，就算找到了他的家。几年之后，韩子栋把“河街”二字忘却了，但把“双槐树”记得很清楚。因之一出许昌城，就向西北方向边走边问，可是走了十多里，也没问到“双槐树”这个村名。他急得没了法，就干脆向人们问“老蒋的哥哥在什么地方住？”那知这一问竟无人不知晓，在人们的指导下，他才来到了河街村。他一走进郑家门，先看到郑大嫂。郑大嫂一看到是他到来，甚为高兴，连忙慌着给他拿烟烧茶。韩子栋问他：“郑大哥怎么不在家？”郑大嫂告诉他，丈夫有事出去了，儿子双喜进城卖烟叶去了，女儿喜云在城里师范上学呢。他们寒暄了一会儿，韩子栋才埋怨着说：“当年您俩口子告诉我，说您家在许昌城西北12里双槐树住，我来了怎么也问不到这个庄子名，您可叫我找的好苦呀！”郑大嫂闻言笑着说：“当年俺给你说的是俺庄东头

有两棵大槐树，那时候您要问双槐树也许人家都知道，后来，这两棵槐树被水淹死了，又被刨了根，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当郑发从外边回来一和韩子栋见面，真是喜出望外，他说：

“当年咱们离别时，就盼着你，一旦出狱到河南，一定要来咱家住几天。你这次来，可得多住一些日子呀！”韩子栋笑着说：

“我这次来，正想托你帮个忙，能否在许昌给我谋个职业干干。”郑发高兴地说：“行，行，俺知道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我给许昌县长是好朋友，明天我就领你到县政府，叫他给你谋个好差事。”韩子栋闻言猛然一怔，他感到县政府是搜捕共产党的是非之地，並不是他去的地方，于是就忙说：“能不能给我找个生意门路，就是去当个下力的伙计也可以。”郑发想了一下说：

“我们村有个叫杨文彬的，在许昌火车站开交通旅社，如果您愿给他当伙计，明天我就领你去。”

韩子栋在郑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一同去到南关交通旅社。这个交通旅社座落在火车站对面的闹市区，旅社规模不大，共有房间十来个，工友三五人。该店经理杨文彬不仅与郑发同村，而且是郑发儿子双喜的丈叔，两家关系甚密。郑发将韩子栋介绍给杨文彬，说韩是他的好朋友，杨即把他收留下来，凡是店内外事务都让韩帮他料理。韩到店后，精明能干，大小事一经他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快博得全店人的好感，因此杨掌柜对他格外器重。一个月后，杨计划去做其它生意，想把旅店托付给他，让他当经理，韩子栋闻听此言，吃了一惊，他害怕自己当了掌柜，事务缠身，难以离去，在此一久，万一暴露身份，事情就更不妙，于是，他就以山东老家来信母亲有病为名，要求马上回家探亲。杨掌柜挽留不住，只好找来郑发，经过他们共同商量，郑

发到河街联保处给他办了个“身份证”。韩子栋拿到“身份证”，高兴万分。临别那天，郑、杨二人亲自到火车站给他送行，郑发帮他买了火车票，又送了盘川。韩子栋坐火车到郑州后，又辗转过黄河到新乡，再步行到滑县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后来在解放军解放山阳谷县时，他又跟随部队回到了阔别十数年的家乡。

韩子栋二次来许昌

自从《红岩》一书出版后，华子良就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那么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解放后身居何地，干什么工作呢？1983年4月间，分别在郑州、西安工作的宋绮云烈士的子女宋振华、宋振亚兄妹（即“小萝卜头”的兄、姊）为帮韩子栋撰写回忆录，他们专程到许昌找到了我，经过交谈，方知韩子栋同志解放后先在中央人事部工作，1958年后到贵州省工作，先后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秘书长等职，年近80岁，身体仍然还很好。宋振华同志在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任副主任。从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每当我出差去郑州，总到供销社去看他。

为了进一步搜集有关郑发找蒋介石认亲的史料，我准备专程到贵阳访问韩子栋同志。1986年冬，在临行之前，我先到郑州找到了宋振华同志，他告诉我说，韩老不久前应邀参加北京少年宫“小萝卜头”塑像落成典礼，现在在北京他女儿秀融家居住，他已应郑州市人大之邀，准备明春4月下旬洛阳牡丹花会期间返回贵州时，途经郑州作短暂停留。如果你想见他的面，也可让许昌市领导邀请他，在他途经许昌时，再作短暂停留，因他40年前在许昌住过，40年后让他故地重游也是件好事。我感到他的意见提的好，回许后我及时把这个意见告诉给市政协领导，他们也非常欢